

---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

王生杰 周志强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联络指导义勇军抗战,还是在宣传、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方面,它都发挥了其它组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救国会的存在及活动和张学良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救国会和张学良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救国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和正确评价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

九一八事变后,为国难家仇所激愤的东北流亡群众很快组织起了各种救亡团体。在依靠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出兵抗日的希望破灭后,各团体都感到有必要加强联合,建立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以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责任,并推动全国的抗日斗争。经过迅速联络和紧张筹备,1931年9月27日,在位于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内,救国会正式宣布成立。

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阎宝航等31人组成。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由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彭振国、熊飞、霍维周、杜重远、李梦醒九人组成。<sup>①</sup>救国会中掌握实权、起支配作用的领导人系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各

---

①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法团和各反日团体的领导人,如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车向忱等。他们均为东北著名爱国人士,倾向进步,多和中国共产党有过接触和联系,深受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

救国会的参加者较为广泛,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东北同胞,他们多为具有抗日思想的爱国志士。救国会入会条件明确规定:“凡是有国家观念,有国家理想者,为进行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sup>①</sup>包括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受共产党领导)盟员在内的广大热血青年,在救国会成员中占绝大多数,是救国会的骨干力量,承担着救国会的大部分实际工作。

救国会明确宣布其宗旨为:“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sup>②</sup>围绕这一宗旨,救国会从多方面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其中组织东北民众武装抗日和开展抗日宣传、唤起全民族共同抗日是其中心工作。

从政治态度上看,救国会是东北流亡群众自己组织的抗日团体,其鲜明的抗日主张和活动与张学良当时所抱之不抵抗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救国会和张学良之间却有着十分密切而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救国会始终受到了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多方支持。

救国会的成立,虽然“事前既无张学良的授意,事后亦无需他的批准”<sup>③</sup>,但在救国会成立之前,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曾接见救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王化一。王化一向张学良提出了联络已经成立的一些东北民众抗日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想法,张学良听后很激动,答应暗中相助。当王化一又要求允许东北军部分将领参加这个群众抗日团体时,张学良亦默许。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王化一于1931年9月26日邀请了高崇民、阎宝航、卢

①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1页。

② 阎宝航:《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0年6月。

③ 阎宝航:《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

广绩等人商议成立统一的民众抗日团体,并转达了张学良的意见。在得知张学良的积极态度之后,与会者遂研究决定:把当时的“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联合起来,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sup>①</sup>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张学良指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文樾派出军警保护会场。这些事实说明,救国会的成立,虽非张学良授意,但却得到了他的默许与鼓励。以后的许多事实也表明张学良履行了当初的诺言。

在组织上,救国会和张学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学良认为救国会中领导层成份复杂,没有一个核心,很难担负重任。因此,他专门指定了幕僚亲信十人在救国会中组成核心组。这十人为: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时称十人团。救国会的大事,一般先由核心组讨论,然后向张学良报告,再提交救国会执委会和常委会讨论。<sup>②</sup>核心组成员、执委会常务委员王卓然,同时又是张学良的秘书,实际上担任了张学良与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直接、间接的鼓励和默许下,东北军中力主抗日的高中级军官如黄显声、熊飞、彭小秋、唐聚五、高文彬、耿继周、郑桂林、李纯华等人加入了救国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在组建义勇军抗战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良对救国会人士十分器重,凡是有关抗日的重大事情都要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商讨,凡是不便由他公开出面去做的抗日救亡工作,都交给救国会去做。张学良常常直接指导救国会的工作,如当救国会同当时的另一个抗日救亡团体——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在援助、指导义勇军问题上发生矛盾时,张学良多次做救国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并从中斡旋,使两会得以消除分歧,团结合作。救国会领导人对张学良也十分尊重,经常主动向张学良请示汇报工作,听从并执行他有关抗日的指示。

①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0页。

② 丘琴、白竟凡、高凌:《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在经济上,救国会得到了张学良的多方接济。救国会成立之初,活动经费很困难,张学良通过北平行营一次性支付了救国会1万4千元。后来,张学良又采纳边业银行的建议,批准救国会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而且他本人每次都带头认购,使救国会每月可获得固定收入2万元左右。<sup>①</sup>救国会的领导人流亡北平期间,都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无着,张学良均给予照顾。阎宝航、卢广绩等人刚到北平时,张学良立即赠送每人生活费200元,并妥善安排居家之处。<sup>②</sup>随后张学良又指示成立一个“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机构,将救国会主要负责人都聘为委员,每人每月给100元薪金。<sup>③</sup>救国会开展的许多抗日救亡活动也得到了张学良经济上和物资上的资助。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化一奉张学良之命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张学良一次就拨款1万元救济普通群众;另外,学生每月发给3元,还有衣物若干。<sup>④</sup>为了收容培养流亡进关的东北学生,救国会创办了东北学院(后改为东北中学),其办学经费主要就是由张学良拨给的。

救国会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张学良的保护。救国会为抗日而奔走,自然成为日寇的眼中钉。日寇在北平的特务机关常常收买、指使汉奸特务对救国会进行骚扰,投递恐吓信威胁救国会领导人。张学良允许救国会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警卫班,并发给枪枝。<sup>⑤</sup>每当得知日本在北平的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消息时,张学良总是及时通知救国会人员提高警惕。他赠给救国会每个常委手枪1枝,以备自卫,还指示北平军分会拨给救国会手枪94枝,以供救国会工作人员作为防身的武器。在救国会成员准备

①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73页。

② 《王化一日记》,1931年9月26日至30日,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档案资料室藏;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③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73页。

④ 《王化一日记》,1931年9月25日,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档案资料室藏。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⑤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第273页。

赴热河援助抗战时，张学良又拨给步枪 20 枝，机关枪 6 挺以加强警戒。<sup>①</sup>

在宣传上，救国会开展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也得到了张学良的保护和支持。救国会在北平组织学生、群众游行时，张学良总是指示有关部门派出军警保护，以防不测。当学生前往张学良北平寓所请愿时，张学良担心卫队军士年轻气盛，不能正确对待。为保护学生爱国行动，避免发生不幸事件，他常向僚属们解释说：“我们不抗而退……实际上确实丧权辱国，学生们出于爱国热情，叫骂几句，又有何妨，我们应当忍辱负重。”<sup>②</sup> 张学良还允许救国会人员到东北军中进行抗日宣传。救国会骨干人员黄宇宙因印刷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材料被军警抓捕，救国会人士向张学良力保，两月后黄宇宙即被释放。<sup>③</sup> 救国会办的《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等宣传刊物，其经费主要是张学良拨给的。

联络组织、援助指导义勇军进行抗战是救国会开展的主要活动，在这方面，救国会得到了张学良的最大支持。首先，张学良充分利用了他的政治影响来支持救国会联络组织义勇军。他同意救国会以他的名义任命各路义勇军司令和高级干部，多次书写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如救国会执行委员车向忱 1932 年 1 至 3 月前往苇河、黑河、珠河会见邢占清、马占山、李杜等部时均带去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件和委任状等。又如救国会联络员黄宇宙 1931 年底潜往辽东联络唐聚五等人组织义勇军时也携带了张学良写在白绸条上的亲笔信。信上写着：“辽吉黑省军、政、民钧鉴：兹派黄宇宙秘书前往慰问，并协助成立联防部，以防胡匪。”在见到唐聚五时黄宇宙特地解释说，“成立联防部”是要大家联合起来，“以防胡匪”；就是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张学良将军恐怕你们对救

① 《任化一日记》，1933 年 3 月 2 日。

②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第 38 页。

③ 《任化一日记》，1932 年 10 月 2 日。

国会的认识不深刻，才写封亲笔信。<sup>①</sup>等到唐聚伍部义勇军有所发展时，1932年8月张学良又通过救国会委任唐聚伍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授予陆军中将衔。其次，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张学良通过救国会给予了义勇军很大的支持。他多次根据救国会的建议和要求，将自己身边的部属派到义勇军中去工作，如彭小秋、高文彬分别被派到义勇军中担任了第一、第五军总指挥的要职。1932年7月，北平军分会的一部分参谋人员也被调到义勇军中服务。张学良还拨出许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凡是义勇军立下战功，张学良都有奖励。1931年11月辽西义勇军受张学良和救国会之命捕杀了汉奸凌即清和张学成，张学良当即各赏现洋5万元。嫩江桥抗战失败后，张学良拨出50万元巨款鼓励马占山重振旗鼓。<sup>②</sup>凡是义勇军将领到北平提出援助要求，经救国会出面，张学良一般都给予一定的接济。较大的援助有两次。第一次是1932年底支援辽南义勇军李纯华等部约20吨军用物资。据敌档记载：“李春华（即李纯华——笔者注）为张学良之特派者，于本月（十二月）初旬，由海路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来（约在关门山攻击战斗10月前）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四门、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四架、轻机枪四架、炮弹二千个、手榴弹五千个，小枪子弹三十万粒、无线电一台，被服、制帽（于上海被服厂制作）二三千件及其它等。”<sup>③</sup>这批武器为辽南义勇军取得关门山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是1932年底，辽东义勇军唐聚伍部退入热河后，张学良通过后援会（当时已和救国会合作专主援助义勇军事宜）接济他们步枪1000枝，手枪100枝，轻机枪20挺，迫击炮24门，子弹数万发，载重汽车3辆，骆驼50匹及服

① 梅钟岩：《仿原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发起人之一郭景珊》，1982年3月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2辑。

②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40—341页。

③ 14—2—88卷未刊原件，辽宁省档案馆藏。

装军鞋若干。另奖赏现金3万元。<sup>①</sup>张学良的多方支持和救国会的积极奔走相配合,极大地支持了东北义勇军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二

救国会同张学良的关系还有一个方面的情况。张学良虽然未完全采纳救国会的主张,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救国会的督促和砥砺,抗日的决心逐渐走向坚定。

从“九一八”到热河抗战期间,救国会领导人多次劝说过张学良坚决地抵抗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卢广绩、金恩祺等人从沈阳来到北平的第二天就曾往见张学良,询问为何不抵抗,当即引起一场争论。阎宝航等人说:国家养兵是对外御侮的,过去打内战,现在有机会对外,为什么不打?张学良回答说,没有准备打不了。由于意见不一,大家不欢而散。<sup>②</sup>以后,凡是一有机会和张学良会晤,救国会领导人总免不了督促张学良下决心抵抗日本侵略。1931年10月21日,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前往顺承王府和张学良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提出四点具体意见:(1)不与日本直接交涉;(2)表明抗日态度;(3)撤换不振作和失职官吏;(4)否认日本成立任何伪造民意团体或机构。这次张学良虽以“目前问题要镇静一步,听候南京的主张,有何结论再说”<sup>③</sup>的答复,回绝了救国会领导人的请求,但对其具体建议还是基本上认可和采纳了的。1931年10月24日,张学良招待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艾迪博士,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等出席作陪。席间,他们又催张学良表明抵抗决心,张学良告以他有说不出的苦衷。12月下旬,在日寇准备攻打锦州时,

① 元仁山:《东北义勇军》,黑龙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② 卢广绩:《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辽宁省参事室编《辽宁文史资料》第7期。

③ 《王化一日记》,1931年10月21日。

救国会多位领导人又趁机前往张学良处促其下决心抵抗，张表示“即将下最大之决心”。<sup>①</sup>当时日寇重兵攻打锦州，东北军守军不足3万，又缺弹械粮饷。尽管如此，张学良一度表示：“倘我愈让而彼愈逼，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sup>②</sup>他七次电告南京政府，要求提供抵抗所需军械、军需和大部队增援。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虽在表面上命令张学良积极抵抗，但对张学良的要求持敷衍态度，只派了一个空军中队和税警团五六千人北上。由此，张学良改变了“下最大之决心的想法”，几乎未作抵抗即撤出了锦州。他以“不为瓦碎”向救国会人士进行了解释，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要是瓦碎则不必”。<sup>③</sup>意即东北军只能和全国一起抗战，不愿单独抗战。但是救国会人士始终没有放弃要张学良坚决抵抗的主张。1932年3月7日，张学良宴请东北在北平的各地方团体代表30多人，席间讨论东北问题，征求大家的处置意见。到会的救国会代表仍请张学良率东北军坚决抵抗。1932年五六月间，迫于日寇的压力，张学良曾打算中止对义勇军的援助，救国会人士又及时向他进言坚请援助义勇军，并要求正规军主力出兵东北。<sup>④</sup>张学良虽未采纳出兵东北的主张，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继续支持义勇军的主张。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榆关，平津震动，救国会又及时敦促张学良全面抵抗。1月4日，救国会召开常委会议，一致形成了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督促南京政府抗战等意见，并希望张学良在热河积极备战。会后，王化一代表救国会向张学良转述了上述意见。<sup>⑤</sup>当时日军曾声言要与张学良“和平解决”“榆关事件”。张学良不完全同意救国会的意见。但是

---

① 王化一《日记》，1931年12月24日。

② 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1931年11月30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③ 王化一《日记》，1931年12月29日。

④ 王化一《日记》，1932年月14日、25日。

⑤ 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61年2月。



当日寇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向热河推进时，张学良还是下决心在热河进行抵抗。1月18日，他与东北军将领联衔通电全国，表示：“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sup>①</sup>1月24日在南京与蒋介石会面时，张学良劝蒋作出了在热河抗战的决定。

救国会主动、积极地争取张学良对他们和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支持。救国会常常把一些背井离乡的学生、携儿带女的难民、衣食无着的抗日烈士遗属引至张学良处，让张学良目睹他们的悲惨境遇，倾听他们的血泪控诉。救国会人员往往利用这种机会要求张学良批拨钱物，救济难民，抚恤遗族，支援义勇军。凡有义勇军各路将领到北平，救国会便引他们面见张学良。仅1932年一年，由救国会引见的各路司令就有钱宝昌、郑桂林、于明甲、陈勃然、项青山、孙经九、张一吼、徐伯林、艾中华、赵大中等几十人。张学良倾听他们在吃穿无着、枪弹匮乏的艰苦条件下英勇杀敌的汇报之后深受感动和鼓舞，当即批现款、衣物、枪弹“交会转办”。当张学良打算停止对义勇军的援助时，救国会不仅直言相陈表示反对，而且还请一些和张学良接近的东北军政要员向其进言，甚至还请张学良的亲属做工作。如1932年夏，庄河县的抗日义勇军成立之后，亟需武器，于是派人向张求援。而此时张学良因有压力正打算中止援助义勇军，因而未允诺。救国会得知情况后便启发义勇军人员去找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于凤至知情后便去做了张学良的工作，对他说：咱家老太爷（指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你不但不给老太爷报仇，相反，群众起来抗日你还不支持。后来，庄河义勇军通过救国会得到了3帆船枪弹<sup>②</sup>。

对于张学良所谓“听命于中央”的消极行为，救国会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抵制。1931年11月，救国会组织了赴上海、南京请愿活

① 《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②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59页。

动,当请愿列车在北平火车站即将开出时,为了向南京方面有所交待,张学良派北平行营副官汤文藻前往劝阻,救国会人士没有听从。随后,张学良又打电话要准备乘车前往上海、南京的救国会委员们前往他的住所谈话,救国会委员没有从命,坚持去了上海、南京请愿。<sup>①</sup>救国会也常常在其所办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救国会常常督促张学良整饬军纪,提高士气,以担当起抗日的大任。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京政府官员魏道明和上海法学院院长郑毓秀前往北平,张学良盛情款待,整日陪同跳舞玩乐。救国会人士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张学良家乡都丢了,国难当头还搞这一套,于是就设法派上海法学院学生去向郑毓秀募捐。魏、郑等人经此一促,便很快离开了北平。<sup>②</sup>还有一次,救国会人士往见张学良,在谈到东北丢失的责任时,阎宝航一时激动,当面指责了张学良。张学良虽在当时感到下不了台,发了火,大声嚷道:“我不抵抗,我不爱国,我可以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但事后冷静下来,他向阎宝航表示了歉意。<sup>③</sup>东北将领汤玉麟驻守热河,贪暴成性,鱼肉人民,毫无抗日守土的责任感与准备。救国会便向张学良建议撤换,得到了采纳,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制约才未能实行。热河抗战中,汤玉麟、万福麟两部望风而逃,不战自溃。临危受命在古北口负责防务的救国会领导人王化一代表救国会向张学良建议: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对于汤、万必须严惩,并提出要在汤玉麟到达古北口时杀掉他。张学良同意了 this 建议,很快派人送给王化一处决汤的密令。<sup>④</sup>只是汤玉麟有了防备,才得以逃脱。

---

① 王化一《日记》,1931年11月5日。

② 卢广绩:《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③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第273页。

④ 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61年2月。

历史事实表明:救国会既是一个社会基础较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众组织,也是一个和张学良有着特殊政治关系的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同张学良的关系,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张学良的保护与支持对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1933年7月31日,随着张学良的去职,在南京政府进一步推行对日妥协外交的情况下,救国会才被迫解散。另一方面,救国会实际成了东北沦陷后,张学良联系关内外东北抗日力量,维系东北人心的政治纽带。救国会和义勇军的英勇斗争,救国会对张学良的督促、激励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使他逐渐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为他以后政治态度的历史性根本转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救国会和义勇军的保护和支持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具体表现。张学良之所以保护、支持救国会,救国会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张学良,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上,张学良和救国会有着根本的一致。无可讳言,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持不抵抗主义,对于东三省的丢失应该负有历史责任。但是,从根本上看,张学良不失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将领。他是在父亲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后主持东北军政的。他主政东北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阻止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为指导思想的。在九一八事变前,救国会人士作为东北各反日团体领导人在东北各地开展的各种反日排日活动,均得到过张学良的保护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虽然出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张学良一方面自觉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他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力量,而寄望国联制裁和南京政府领导全面抵抗,不愿东北军单独抵抗消耗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其内

心深处对此又不无矛盾和悲愤。他自责“守土无方,罪行如山”。<sup>①</sup>他痛感:“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sup>②</sup>张一再在各种场合表示:“不贪生,不怕死”,“不屈服、不卖国”<sup>③</sup>,“以身许国,宁计其它,一息尚存,誓与周旋!”<sup>④</sup>张学良在抗日救国的根本目标上,和救国会并无分歧。正是这种一致使张学良在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在内心深处又对救国会坚决的抗日主张和为抗日奔劳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赞赏。故而他支持救国会和义勇军的斗争与日寇周旋。1934年1月,由海外返回国内时,张学良颇有感慨地对原救国会的领导人说:“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有的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你们虽然哪也没去接我,却在搞抗日救国,支援义勇军。我看那些接我到新加坡、到香港的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在做些实际工作!”<sup>⑤</sup>这应是张学良对救国会工作的总评价,同时,也道出了救国会和张学良之间建立起特殊关系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政法系)

(责任编辑:刘兵)

---

①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页。

②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第231页。

③ 洪钊:《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④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500页。

⑤ 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